

激发市场活力 应对经济下行

项峰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一方面要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另一方面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李克强总理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不能主要依靠宏观政策的数量扩张,还是要依靠改革,在目前阶段,就要把市场活力激发出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过去一年,为应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我国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而主要依靠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这些情况表明,宏观经济政策数量扩张效应短暂,而激发市场活力才会真正凝聚形成经济增长动力长期效应。

政策刺激效应加快衰减

采取宏观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存在前提,即宏观政策属于经济运行外生变量,刺激政策将对经济运行形成外部冲击,引发社会供求关系变化,熨平宏观经济波动。但宏观经济运行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主动有意识行为,若政策刺激被理性预期,将会降低政策

刺激效果。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刺激效应逐年递减,代价逐年上升。从最长一半政策效应期缩短至半年以内,而投资拉动造成地方政府债务急剧扩张,社会债务杠杆率也在上升,增加了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刺激及措施存在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场对政策刺激模式与规模存在理性预期,微观经济主体主动调整以应对政策环境变化,部分抵消了政策刺激效果。就全球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过去5年,2008年年末到2009年上半年期间,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协调一致、数量可观的政策刺激,但至今全球经济仍在复苏之路上艰难运行。加快经济结构改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我国社会创新空间巨大

我国人口规模较大,市场容量宽广,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劲发展潜力。历史与实践表明,我国社会创新创业的主要动力在基层。无论是包产到户创新,还是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崛起,都是基层大众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不断突破的结

个税改革要通盘考虑

杨涛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宇通集团董事长汤玉祥在小组审议时表示,个税起征点应该上调至8000元到1万元,以增加职工收入。

提高个税起征点,是本次两会代表、委员发出最多的声音之一。在河南省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振甫也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个人所得税法》。

的确,个税起征点3500元,相对于目前的物价水平而言,显得偏低。汤玉祥说,宇通集团今年给员工涨薪30%,但是增资额的相当一部分需要拿来缴税。3月6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回答个人所得税相关问题时说,个人一个月收入5000元,日子可以过得不错,如果有抚养、有赡养,那么日子就很艰难。

这些年来,个税起征点不断提高,从8000元到16000元,从16000元到20000元,再从20000到35000元。尽管如此,每年“两会”代表、委员仍然不断地呼吁要提高个税起征点。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这些年物价水平飞涨,而工资水平滞后于物价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税制包括个税的改革滞后。

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上,应当建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物价水平自动挂钩的机制。个税起征点是固定的,但物价却每年都上涨的趋势,以固定的个税起征点对应上涨的物价,当然会给人不公平的感觉,也让人们感觉到负担的逐年加重。早在几年前,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就建议,个税

起征点可以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挂钩,每3年自动调整一次。可以用相关程序固化下来。如果建立了这样的机制,那么,个税起征点就能自动调整,用不着代表、委员年年来“两会”呼吁了。

个税改革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改成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即综合所得制。目前,我们的个税并没有考虑到家庭抚养、赡养老人、教育费用、大病减免等综合因素,实行法定免税、申请减税、退税制度。但是,在许多西方国家,个税有许多抵扣方式,能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一些国家的税收主要以家庭全年收入计算税率,并且,家里需要供养的孩子越多,所获退税也就越多;印度农民无须缴纳个税;在日本,个税起征点根据家庭成员的人数多少而不同。因此,我们应当尽快建立综合所得税制,完善减免和抵扣制度。

个税改革也要与其他税制改革同步进行。目前,我国70%以上的税收来自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的税种,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的税种。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大,但他们的流转税所占的比重却很小,在美国和日本,来自流转环节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6.8%和18.6%。所以,如果我们加强对个税的征收,在其他税上就要有所降低,要让公民和全社会承担的税收总体平衡。

目前我们赞同提高个税的起征点,但是,从长远来看,就必须对包括个税的税制进行综合改革,让公民税负公平、合理。

果,在现有经济运行体系内挖掘出新的盈利机会。过去十年内我国互联网经济迅速崛起,网络购物从想象、落地到现在普及,无不反映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巨大能量。根据艾瑞咨询发布数据,2014年我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8万亿,增长48.7%,仍然维持在较高增长水平。另据国家统计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2014年我国网络购物交易额大致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7%,年度线上渗透率首次突破10%。互联网金融也为金融业增长注入新动力,传统银行触网和网络企业涉足金融,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区年轻人高科技创新活跃,社会示范效应突出,影响广泛。201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46.9%提高到48.2%,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

创新创业既是个体或群体劳动成果,也带有鲜明经济利益导向。实体经济运行存在潜在获利机会,创业是发现、实现获利机会的重要途径。技术与工具创新可带动成本下降促进产量提升,从而获得比较优势。综合来看,创新创业是市场活力重要体现。创新创业虽然属于微观经济主体主动经济行为,但政策约束会降低社会创新创业活跃度。比如政策审批、行业门槛、行政手续繁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创新创业成本上升,减少创新创业盈利机遇。我国政府部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行政审批路径依赖。在市场增量改革向市场存量改革转化时,过度行政审批将会减少经济运行潜在盈利机会。为此,新一届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

提前实现。下一步,各级政府在下放权同时,还需提升监管能力,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破解宏观政策传导障碍

当然,激发市场活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也需要宏观政策予以支持与保障,防止经济出现断崖式下降。由于过去一年我国没有采取强刺激政策,今年宏观政策空间较去年要大。今年我国物价形势发生较大变化,物价回落明显释放了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为应对经济运行可能跌落正常区间,就要及时出手,适当调整宏观政策。但要破解宏观政策传导障碍。一是要差异化政策应对区域经济不平衡。我国幅员辽阔,尽量避免一刀切政策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冲击,而统一政策也不符合我国各地发展不均衡的客观实际。二是结构化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定向调控具有鲜明结构调整特点,有助于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三是前瞻政策调整及时应对经济波动。要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监测分析,及时发现苗头性趋势性变化,前瞻性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个人和企业要勇于创新创业,全社会要厚植创新创业文化,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

焦点评论

工商总局:从严查处“水货客”大量采购行为



收紧香港自由行?各方争论难消停。是非非水货客,起起落落两地情。商品交流顺大势,政府监管求共赢。一国两制呵护好,互惠互利得民心。

唐志顺/漫画
孙勇/绘

开发性金融助力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

郭谦

我国经济正在走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新常态,开发性金融要为中国经济从旧模式到新常态的顺利、平稳过渡“托底护航”。

2014年以来,定向宽松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导向,而以国开行为代表的开发性金融成为定向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

一是再贷款。再贷款是人民银行引导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而国开行就是投放再贷款的重要渠道。2014年,央行通过国开行释放宽松信号,国开行承接央行再贷款资金,重点投向新型城镇化及相关民生领域。

二是抵押补充贷款(PSL)。2014年,央行通过1万亿PSL来支持国开行的棚户区改造,而国开行累计发放棚改贷款

4086亿元,多次下调棚改贷款利率,减免利息金额达20亿元。

三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国开行近一年多来成功发行了10期证券化产品,包括5期铁路专项产品和5期混合资产产品,总规模达1013亿元,发行期数、规模、种类均居国内银行首位,更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开发性金融保障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量大,主要依靠政策性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国开行积极探索运用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2014年共发放新型城镇化领域贷款近万亿元,占全行人民币贷款的近七成。棚户区改造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工程,国开行也给予大力支持,近年共累计发放棚改贷款8047亿元(截止2014年末),支持了全国30多个省(区、市)棚户区改造,涉及总建筑面积约8.6亿平方米,惠及居

民近875万户。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投融资体系是其中的重要配套。2014年APEC峰会就把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作为一个重点议题。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至2020年,亚洲地区需要投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国开行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是上合组织国家银团、中国和东盟国家银团、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的成员行,同时也是丝路基金的联合发起机构之一,其国际业务贷款余额超过3000亿美元,巨大的资金支持将为“一带一路”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国当前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升级刻不容缓。核心优势产业的培育意味着大量科研与开发费用的投入,许多科技创新企业的初始阶段以及老工业基地的改造阶段急需政策性金融扶持。据统计,我国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为2.08%(2013年),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平均3%左右的科研投入差距较大。根据规划,我国“十二五”期间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将提高到2.2%,至2020年提高到2.5%。

国开行作为我国中长期投融资领域中的主力银行,对具有重要意义的科技产业领域给予了大力支持。例如,国开行为华为公司提供低利率中长期贷款,支持其进行科技创新、海外拓展。国开行还为中国南车等企业提供重点项目科研资金,使得我国高铁的建设运营和设备制造跃升为世界领先水平。

2015年,开发性金融将继续用好定向货币政策,大力支持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产业升级,发挥其托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作用,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路护航。

(作者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发中心主任)

■ 鹏眼 | Huang Xiaopeng's Column |

我们为什么需要房产税

——辨析房产税(上)



黄小鹏

“两会”期间,有关房产税的舆论再度升温。有信息显示,房产税虽然争议缠身,但其立法工作仍在推进之中。一项重要的立法,其成功离不开社会基本共识。围绕房产税的争议十分激烈,这固然主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但观念的因素也不可否认,事实上,这一问题虽然吸引了很多人参与争论,但过去几年在相关理论上并未获得应有的突破。

我们为什么需要房产税?房产税与70年土地使用权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房产税的推出一定会曲折难推,即便强硬推出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问题。

对于房产税的必要性,人们的认识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房价调控的工具。过去十年,频繁的房地产调控最终皆归于失败,故而人们希望引入房产税这一新型的、更有效的工具。2013年11月,《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明确了房地产调控工具的地位。二是作为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一个办法。一直以来,地方的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依赖的最重要来源是土地出让金,随着大多数地区土地市场趋冷,各地债务压力凸显,债务风险隐现,于是一些人认为开征房产税是个好办法。不能说这些出于短期或眼前因素的考虑没有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受这些“急功近利”因素驱动而开征房产税的话,其动机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而基于此设计出来的房产税难以顺畅运转也是大概率事件。

房产税无疑可以成为市场调控工具之一,相对于限购、限贷、增加交易环节税收等调控方式,房产税也确实可能具有更好的效果,但房产税要发挥对房价的调节作用是一定的前提,当其它因素与房产税的调节功能相冲突时,房产税对稳定房价的作用可能非常有限,甚至可能完全为零。

从各国历史看,房产税并未成为抑制房价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近几十年来,不同时间段不同国家都曾出现过房地产泡沫甚至严重的泡沫,有些还造成了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这些国家中,既有高收入国家,也有低收入国家;既有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大量早已完成城市化的国家,甚至像城市化率高达90%以上的北欧也出现过比较大的泡沫,而发生泡沫的国家大多数都不缺少房产税。从表象上看,房地产泡沫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美国那种由“买不起房子的人纷纷买房”造成的,也有中国这种由“不需要房子的人大肆买房”造成的,还有因别国腐败或政局不稳大量资金涌入、由“外国势力”吹起泡沫的情况。尽管各国经济情况差异很大,泡沫在表象层面上千奇百怪,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即都伴随着货币流动性的宽松,而不是因为它们缺乏房产税,也不是因为该税率过低。这些经验事实表明,如果没有货币层

面的配合,单纯地寄望房产税让房价达到合理水平,是不现实的。

对中国来说,房地产泡沫持续多年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即政府对房价提供了隐性担保,这个因素是大多数国家没有的。因为不论是所谓的刚需,还是投资投机需求,他们之所以敢于和乐于在任意房价租金比和房价收入比上买入住房,不是因为房产的真实回报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不让房价下跌的隐性担保。只要这个担保不撤除,其它的任何政策都是无效的。在过量货币供应下,资金会涌向各个领域,但有担保房地产领域肯定是首先,即便在货币供应并不宽松或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有限的资金也很可能首先涌向有政府担保的地方,以追求安全,因为越是经济形势不好,政府对房地产隐性担保兑现的可能性越大。

因此,只要其它因素形成足够的推力,让房价形成向上趋势,房价每年的涨幅就可以轻松抵消掉1%左右(房产税率不可能随意提高,也不可能设置得非常高)的房产持有成本。只要具备这样的条件,房产税抑制房价就会毫无作用,而这也正是大多数存在房产税的国家仍然发生房地产泡沫的情况。

其次,政府一缺钱就想到增加新税种、开辟新税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未来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民众对政府缺乏有效监督导致大量脱离实际能力的基建大跃进,严重的建设浪费和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的过度消耗,是地方债务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如果地方政府不是先“量入为出”,而是“量出为入”,先大肆花钱,等出现资金缺口后再向民众伸手,这种做法未来会越来越难行得通。

所以说,从抑制房价和填补财政缺口两点出发推出房产税,动机本身就存在问题,结果也很难乐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现在相当一部分民众之所以对房产税持支持态度,是因为他们认为房产税可以有效抑制房价上涨,未来如果因为其它因素的干扰导致抑制房价失败,他们很可能转而成为房产税的反对者。

但是,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开征房产税,笔者反对的是从上述狭义动机出发征收房产税。开征房产税,正确的动机应该是完善税制,抑制房价与增加地方财源应该是其附带的结果。设计房产税框架的时候,只有很好地平衡表层目标和长远目标,在保证总量税收不增反减的前提下精心筹划,公平优先,才能得到支持,才能避免给未来埋下隐患。

中国当前的税收收入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占比小且存在很多漏洞,财产税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税收结构已经造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和财产积累不断增加且分化日益扩大,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是与经济落后,普遍缺乏个人财产的情况相适应的,在今天的这种税制下这种税制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流转税为主体税率过高的情况天然地不利于实业经营,而容易鼓励各种财产投机行为。在开放的环境下,国内外市场还会因中国流转税过高而隔离、扭曲,使本土消费市场与国际产生了脱节,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

房产税的优势何在?当今环境下开征房产税与70年土地使用权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房产税在设计中应该注意哪些细节问题,本专题将在随后的文章中进行探讨。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 ppll18@126.com。